KHARISMA: JURNAL ILMIAH TEOLOGI
Vol. 7, No. 2 (2026): 92–106 ISSN: 2722-6441 (online), 2722-6433 (print)
Diterbitkan: Sekolah Tinggi Teologi Kharisma, Bandung http://jurnalsttkharisma.ac.id/index.php/Kharis/

接纳难民：米罗斯拉夫·沃尔夫（Miroslav Volf）的“拥抱”神学与教会对难民及移民的跨文化事工

Daniel S. Simanjuntak[1], Firman Simanjuntak[2]
Sekolah Tinggi Teologi HKBP Pematangsiantar
danielzoentax@gmail.com[1]

摘要
移民，尤其是难民，常被视为可能构成威胁的“陌生人”，而教会迄今尚未确立回应他们的具体神学框架。因此，接纳往往停留于慈善层面，而未成为信仰所要求的约束性呼召。本研究借助沃尔夫的“拥抱”概念，重构与边缘群体关系的神学理解，并阐明其在教会对难民的跨文化事工中的具体体现。研究采用定性文献研究方法与建构神学进路，涉及处境议题、与移民研究及他者哲学的批判性对话，以及对圣经和神学资源的重新发掘。研究结果表明，沃尔夫“拥抱”的四个阶段（张开双臂、等待、拥抱与松开）可被重新阐释为一种事工模式，即开放、尊重文化自主、执事性与倡议性参与，以及在不强制同化的前提下保存身份认同。

关键词：拥抱；移民难民；跨文化服务；建构性分析

引言

因身份差异而产生的社会群体间紧张关系，已成为几乎普遍的现实。身份各异的群体往往难以与多数群体建立平等关系，其最恶劣的表现之一便是对移民的排斥，尤其是对那些被迫逃离家园者的排斥。依据联合国的定义，移民是指在本国以外居住至少一年的人；仅在2005年，全球国际移民就约有2亿人，其中包括900万难民，他们逃离的不仅是贫困，更是迫害或死亡的威胁。[1]其原籍国未能提供安全保障，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脆弱处境，[2]因此，他们与接收社会相异的多重身份，使其很容易被视为无权无势（*powerlessness*）而又同时成为猜疑对象的“陌生人”（*stranger*）。

这种猜疑往往发展为仇外情绪。例如在美国，来自冲突频发国家的穆斯林移民，尽管政府发布了各种备忘录，仍面临高度的歧视；[3]新冠疫情使移民成为人们对威胁、不确定性和失控的集体恐慌的对象，而这些恐慌实际上与他们并无直接关联，类

[1]Khalid Koser,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5, 12.

[2]Alexander Betts dan Paul Collier, *Refuge: Transforming a Broken Refugee System* (Penguin Random House UK, 2017), 27.

[3]Zaitun Mukaromah dkk., “Kebijakan Pemerintah Amerika Serikat terhadap Migran (Muslim),” *Jurnal Mercatoria* 15, no. 2 (2022): 80–82, https://doi.org/doi.org/10.31289/mercatoria.v15i2.7362.

似的模式也由此出现。[4]法律与制度进路同样被证明不足以触及这一问题的根源：全球难民体制使他们面临营地、城市贫困或危险旅程之间的惨淡选择，同时仅将其经历转化为合法／非法的行政类别，从而把他们贬为被管制的对象。[5]这种处境呼唤一种神学进路，它须触及人与"他者"关系的本质，而不止步于法律或慈善的框架。

迄今为止，学界对米罗斯拉夫·沃尔夫已有大量研究，尤其集中于"拥抱"概念，视其为身份冲突中的和解模式。沃尔夫本人是在巴尔干后冲突情境中发展出*embrace*（拥抱）这一理念的，强调在不丧失自身身份的前提下向"他者"敞开自己。既有研究大致集中于以下方面：（1）对*embrace*意涵的哲学—神学阐释，视之为民族和解的隐喻，[6]以及印度尼西亚包容且人文的基督教教育模式；[7]（2）*embrace*在不同宗教群体间社群冲突情境中的应用；[8]（3）对*embrace*的批评，认为其作为一种模式，对在不处理不公义之结构层面的情况下实现和解的可能性过于乐观。[9]然而，这些研究既未专门将*embrace*概念与移民难民议题联系起来，即未将其与遭受双重身份被拒斥之经历的群体相联系，也未将其发展为教会在地方层面可操作的跨文化事工模式。

本研究特别使用"移民难民"一词，指因暴力威胁、迫害或国家未能提供保护而被迫离开本国的移民，不包括为谋生而自愿迁移的经济移民劳工，也不包括法律身份仍在行政程序中的寻求庇护者。本研究运用米罗斯拉夫·沃尔夫的*embrace*概念，旨在回答三个问题：从沃尔夫的视角如何理解拥抱概念；移民难民如何在社会层面被建构为"陌生人"；以及*embrace*概念如何被重新阐释为一种具体模式，使教会成为在对移民难民的跨文化事工中得以实现的*embrace*共同体。因此，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提出对*embrace*四个阶段的重新诠释，即空间的开启（*opening*）、延迟（*waiting*）、接纳（*receiving*）与再度开启（*re-opening*）；这些阶段迄今一直被解读为人际或社群和解的模式，本研究则将其转而引向教会对移民难民跨文化事工的具体框架。本研究将

[4]Victoria M. Esses dan Leah K. Hamilton, "Xenophobia and anti-immigrant attitudes in the time of COVID-19," *GPIR: Group Processes Intergroup Relations* 24, no. 2 (2021): 254.

[5]Betts dan Collier, *Refuge: Transforming a Broken Refugee System*, 62.

[6]Joseph Useni, "Miroslav Volf's Theology of Memory in Relation to Zimbabwean Social Narratives," *Religions* 16, no. 131 (January 2025): 1–13.

[7]Frans Pantan, "Humanistic and Inclusive Christian Education: A Framework for Learning Transformation," *HTS Teologiese Studies / Theological Studies* 81, no. 1 (May 2025): a10488, https://doi.org/10.4102/hts.v81i1.10488.

[8]Jee Yun Kwon, "The Understandingof the Issue of Yemenirefugees in Korea," *Muslim-Christian Encounter* 11, no. 2 (September 2018): 81–112, https://doi.org/10.30532/mce.2018.11.2.81.

[9]C. A. Strine, "Embracing Asylum Seekers and Refugees: Jeremiah 29 as Foundation for a Christian Theology of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Political Theology* 19, no. 6 (August 2018): 478–96, https://doi.org/10.1080/1462317X.2018.1504730.

*embrace*的每一阶段重新阐释为回应移民难民双重身份之脆弱性的牧养实践，同时也为摆脱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法律进路与慈善进路的局限提供出路。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方法，以文献研究（*library research*）为设计，通过搜集、考察和分析书籍、期刊论文及相关教会文献等各类资料。[10]建构神学被用作主要进路，它将非神学资源定位为形成和发展神学思想之过程的起点。这一进路从信仰与社会的想象出发，以期阐明一种能够为周遭世界建造信仰之家的神学建构。在此框架内，建构神学还特别关注神学的审美维度，这使其有别于更侧重神学思想结构之系统编排与秩序的系统神学。[11]藉由这一进路，米罗斯拉夫·沃尔夫所发展的拥抱概念被定位为一个想象性对话的空间，同时也是一种建构性工具，用以阐明在与“陌生人”建立关系时具有处境性且切合实际的神学理解。这一建构过程始终考虑塑造相关各方之存在与经历的背景、挑战、动机及其他各种因素，从而使双方之间的有意义的对话空间成为可能。

为了系统地回应研究问题，数据分析按顺序分六个程序性阶段进行。各阶段彼此关联，并有助于构建一条连贯的分析线索，从问题的识别直至事工模式的阐述。整个研究过程以如下图表示意呈现：



[10]Albi Anggito dan Johan Setiawan, *Metodologi Penelitian Kualitatif* (CV Jejak, 2018), 8.

[11]Joas Adiprasetya, *Berteologi dalam Iman: Dasar-Dasar Teologi Sistematika-Konstruktif* (BPK Gunung Mulia, 2023), 24–25.

研究结果与讨论

拥抱概念导论

Embrace（拥抱）所包含的维度比单纯的宽容或接待更为深刻，因为这种接纳要求一种开放性，而这种开放性同时使主体处于脆弱的境地。拥抱者必须预备好宣告接纳，也必须甘愿面对这种开放所带来的关系后果。这一原则与接待（hospitality）的理念相呼应，尤其体现在接纳和照顾陌生人的责任上。方（Fong）通过*shamar*这一概念，将欢迎陌生人的实践与基督徒的身份和使命联系起来，该概念强调守护、看守与照顾的行动。[12]在古代以色列的经验中，他们将作为陌生人和寄居者的经历视为其集体身份的一部分，这同时也是向陌生人提供保护与照顾的道德理由。[13]因此，*embrace*可以成为理解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神学框架。

“拥抱”（*embrace*）一词本身所含的接纳之义，比单纯的身体动作更为宽广。就其语言史而言，该词可追溯至古法语*embracier*，指拥抱或全心接受的行为，其拉丁词根为*im-*（意为“在内”）和*bracchium*（意为“手臂”）。随着发展，英语中的embrace也被用来描述欢迎、接受并向某事或某人敞开自己的态度。[14]这种意义的扩展可通过克尔尼（Kearney）的思想从哲学上加以解读，他将对他者的接纳定位为超越自我支配地位的过程。人被要求不以自己为首要尺度，而是要为他者的临在腾出空间，包括先前未被考虑在内的经验或可能性。[15]

米罗斯拉夫·沃尔夫视角下的拥抱

沃尔夫认为，邪恶、仇恨与流血的根源，在于未能以健康方式回应的他者性（*otherness*）问题，这使他归纳出两种范式性回应，即排斥与拥抱。[16]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这一理念本身即形成于他在前南斯拉夫经历战争暴力的经验。米罗斯拉夫·沃尔夫是克罗地亚裔美国神学家，现任耶鲁大学亨利·B·赖特（Henry B. Wright）神学教授，[17]他将这一概念建立在对加拉太书2:19–20的解读之上：人的自我有一个中心，但

[12]Paul C. Fong, “An Understanding of Christians’ Roles in Human Migration through the Biblical Theme of Shamar: From Genesis to the Good Samaritan,” *Religions* 14, no. 5 (2023): 6–8, https://doi.org/10.3390/rel14050600.

[13]Christine D. Pohl, *Making Room: Recovering Hospitality as a Christian Traditio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5.

[14]Raymond J. Gibbs, *Methapor Wa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23–24.

[15]Richard Kearney, *Strangers, Gods and Monsters: Interpreting Otherness* (Routledge, 2003), 77.

[16]Huen Wai Yan, “Miroslav Volf’s Theology of Embrace, Vernacular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Hong Kong Identity,” *Practical Theology* 15, no. 3 (2022): 222, https://doi.org/10.1080/1756073X.2021.2009623.

[17]Miroslav Volf, *Exclusion and Embrace: A Theological Exploration of Identify, Otherness, and Reconciliation* (Abingdon Press, 2019), 43.

这一中心是错误的，需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从而被一个不以自我为中心的新中心所取代。[18]在这一点上，笔者看到了沃尔夫论证的力量与脆弱之处：其力量在于坚决拒斥作为排斥之根源的自我中心，而其脆弱之处在于有将自我钉十字架浪漫化的风险，却未考虑到那些长期被牺牲者（移民、难民）恰恰需要对自我的肯定，而非进一步的自我湮灭。沃尔夫本人似乎也意识到这一风险，因为他主张，在真相被说出、公义得以施行之前，拥抱不可能发生；恩典并不否定对公义的要求，尽管他仍将恩典置于首要位置。[19]

沃尔夫主张，与自己的族裔、文化或民族根源保持距离，会开启一个混合性空间，既容许他者性被纳入，又提供一个据以评判不公义的视野。[20]克里斯蒂亚万（Kristiawan）将沃尔夫的这一进路解读为一种渗透性身份（porous identity）模式，这种身份为他者腾出空间，并愿意被纠正和丰富。[21]尽管如此，笔者认为，“渗透性”一词的界限需要更为明确，以免陷入身份相对主义，而这将损害难民等少数群体，他们的身份本已因被迫流离而脆弱不堪。需要看到，难民并非享有流动身份这一奢侈的抽象群体；他们恰恰是在奋力争取被承认那些已被夺走的法律身份、文化身份与人的身份。若将“渗透性”理解为没有限度，难民可能失去据以要求公义的立足点，因为不再存在可作为参照点来捍卫其最基本权利的“中心”。因此，沃尔夫的框架不能仅仅依赖无条件的开放。它要求一种伦理承诺，即继续承认需要一道暂时的“墙”来保护弱者，同时保留一扇始终为相遇敞开的“门”。若缺少这种张力，*embrace*就有沦为空洞的包容修辞的风险，无视需要确定性与保护的难民的具体苦难。为此，沃尔夫始终坚持，基督徒的身份需要距离，这意味着只要边界与中心都为着拥抱而运作，它们就依然存在。[22]沃尔夫所选择的人际—个体进路，出发点在于人的身份始终是处境性的、多层次的，因此他的首要关注并不在于何种社会秩序是理想的，而在于每个个体如何被塑造得向他者敞开。[23]这一出发点正是笔者选择以*embrace*而非社会公义理论作为首要框架的原因：因为正如将要表明的，移民难民问题归根结底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愿意承认“他们”是完整的人。

[18]Volf, *Exclusion and Embrace*, 63–65.

[19]Volf, *Exclusion and Embrace*, 20.

[20]Volf, *Exclusion and Embrace*, 8, 43–44.

[21]Danang Kristiawan, “Merengkuh Yang Lain: Dialog Interreligius Dan Transformasi Diri Terhadap Yang Lain,” *Mitra sriwijaya: Jurnal Teologi dan Pendidikan Kristen* 1, no. 1 (2020): 69.

[22]Volf, *Exclusion and Embrace*, 11, 61.

[23]Volf, *Exclusion and Embrace*, 22.

身份认同与难民移民作为“陌生人”的疏离

身份认同不能被视为一种业已完全成形、不受变动影响的实体。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认为，身份并非永久附着于个人或群体的某种东西，而是通过表征实践动态展开的形塑过程之结果。然而，霍尔并未全然否弃本质主义的身份观，因为这种身份在反殖民与反种族主义的斗争中仍可作为动员的基础，只要它不被置于绝对且不容质疑的范畴之位。[24]列维纳斯（Levinas）的思想中也可见类似的关切，尤其是他拒斥以自我的范畴使他者的存在完全可被理解的企图。在列维纳斯看来，他者（the Other）的存在超越主体的理解与掌控。将差异同化入统一身份的努力，有可能抹去他者的独特性，并催生排斥的机制。[25]这两种思路为理解一种以自身为他人存在之中心与尺度的身份认同所蕴含的危险，提供了批判性的基础。然而，在研究者看来，对封闭身份的批判本身并不能说明差异如何在具体关系中得到接纳、容纳与实现。因此需要一种能为形成包容性关系提供神学取向的进路。米罗斯拉夫·沃尔夫（Miroslav Volf）关于拥抱（embrace）的思想正是在此显出其位置。

在社会层面，难民移民通常在语言、宗教与文化习俗上有别于东道国居民，往往具有“外国人”或非公民的法律身份，并且常被当作经济问题的替罪羊，而这些问题实际上源于国家政策，尽管并无实证数据支持这一指控。[26]艾哈迈德（Ahmed）阐明，“陌生人”并非我们尚未遇见的人，而是那些已被认定为“不属于此处”、已“越过边界”并靠得太近的人；这种认定过程并非中立，因为它区分了谁有合法的居住资格、谁受到怀疑。[27]在霍尔的框架中，移民被表征为经济威胁或文化危险；在列维纳斯的框架中，陌生人的面容本应提出伦理的要求，却常被贬低为单纯的威胁。[28]这种脆弱性对于无证件者而言更为尖锐，例如移民工人受到暴力管控、工资被单方面克扣，或被迫超出合理限度劳动。[29]这印证了源于“陌生人”身份的结构性脆弱跨越各种类别，因而为难民移民所发展的神学论证具有更广泛的伦理适用范围。

法桑（Fassin）进一步指出，基于“怜悯规程”的接纳，例如仅向患有严重疾病的移民发放居留许可，最终把移民化约为受苦的身体，其在场的正当性也因此取决于这

[24]Stuart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22–23.

[25]Emmanuel Levinas, *Totality and Infinity*, terj. Alphonso Lingi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1), 36, 79.

[26]Stephen Castles dkk.,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18–19.

[27]Sara Ahmed, *Strange Encounters: Embodied Others in Post-Coloniality* (Routledge, 2000), 21, 23–25.

[28]Ahmed, *Strange Encounters*, 25; Levinas, *Totality and Infinity*, 213.

[29]Jeremy S. Norwood, “Labor Exploitation of Migrant Farmworkers: Risks for Human Trafficking,” *Journal of Human Trafficking* 6, no. 2 (2020): 8.

种苦难本身。[30]研究者认为，法桑的分析框架尖锐地揭示了慈善进路的根本弱点：它看似富有怜悯，实则维持着同一种权力结构，因为接纳仍由东道群体依据其自行设定的资格标准单方面决定。鲍曼（Bauman）指出，移民的在场往往被视为“坏消息的携带者”，是稳定秩序崩塌的表征，以致对全球化的结构性愤怒被发泄在同样是其受害者的人身上。[31]正如鲍曼所强调的，这一矛盾处境无法仅凭爱或恨的简单方案来化解，而需要愿意通过“双重视野”（*double vision*）来减少伤害，即同时从两个方面审视问题。[32]

作为难民的基督与拥抱的呼召

本研究的神学建构首先立足于耶稣本人曾是难民移民这一事实。马太福音 2:13–18 记述耶稣一家前往埃及，是为逃避希律下令施行的暴力威胁，因此这一事件更应被理解为由危及生命的处境所造成的流离失所经历，而非基于自由选择的迁移。这一叙事不仅描述了一个历史事件，还通过引用何西阿书 11:1“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太 2:15）而承载神学意涵。马太将耶稣的旅程与以色列的历史相联系，把弥赛亚的经历呈现为与一个曾经历压迫、疏离与解放的民族之历程相延续。这一叙事联系表明，神的拯救行动并不脱离那些受威胁、被驱逐者的生活实况。当透过沃尔夫的拥抱神学来阅读时，这一视角便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基督生命中的流离失所经历，为重新思考基督徒如何看待当代难民提供了基础。他们不仅被安置为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更是其在场开启了相遇、接纳以及认出基督之空间的同胞。

这一论证在马太福音 25:31–46 中得到强化，基督在此将自己等同于被接待或被拒绝的“陌生人”（*xenos*）：“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希腊语词 ξένος（xenos）在公元一世纪希腊罗马世界的语境中，其含义比地理意义上的“陌生人”更为宽泛。该词指称处于社会保护网络（恩主与门客关系）之外、已丧失进入城邦（polis）及保护其公民的法律体系之途径的人。这是一个脆弱的形象，没有身份，也没有声音。马太群体自身很可能在公元 70 年之后生活于与耶路撒冷当局及占主导地位的犹太社会相冲突的处境中，因此他们十分了解身为 xenos 并被边缘化的经历。这种历史意识塑造了他们的款待神学：接待陌生人并非施舍，而是一个自身也曾一度“陌生”的群体之身份的体现。因此，对经文的解读不应再局限于视其仅为劝人善待陌生人的伦理劝勉。其中蕴含着远为激进的基督论宣称：接待难民移民本身即成为末世审判的标准，而非众多虔敬之行中的一项。布伦斯登（Brunsdon）与马盖齐（Magezi）确认，这段经文与希伯来书 13:1–2（“不可忘记以殷勤待客，因为曾有人这样做，不知不觉就款待了天使”）一道表

[30]Didier Fassin, *Humanitarian Reason: A Moral History of the Present*, terj. Rachel Gomm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21, 85.

[31]Zygmunt Bauman, *Stranger at Our Door* (Polity Press, 2016), 17.

[32]Bauman, *Stranger at Our Door*, 19–20.

明，教会作为神的群体，在本质上被呼召去拥抱、接纳并整合移民，即便存在对犯罪与社会风险的恐惧。[33]

纳德拉（Nadella）更广泛地将马太福音解读为一场跨越并打破界限的运动，从仅仅接待陌生人，进而视其为神的显现（*theoxenia*），这为接待陌生人同时缓解仇外情绪提供了神学基础。[34]对一位身为难民的弥赛亚的忠诚，要求接待那些在异乡没有家园、资源或朋友的人；[35]基督徒蒙召，不仅要将基督当作陌生人来接待，也要效法他作为接待者，正如神自己继续张开双臂接待那些使自己与他疏离的人类。[36]这一圣经论证超越了主要建立在个人经验与他异性哲学之上的沃尔夫进路。它提供了一个圣经根基，使拥抱获得基督论—末世论的锚点，成为衡量信仰本身是否忠实的尺度，并且不能被化约为教会可有可无的伦理选择。

拥抱作为难民移民的神学框架

面对流离失所与移民的现实，教会的身份认同不应通过将自身群体与作为陌生人到来者分隔开来的界限来建构。米罗斯拉夫·沃尔夫关于拥抱（embrace）的思想提供了一种神学视角，使教会得以理解对难民移民的接纳不仅是一种怜悯行为或人道援助，而且是一种关系性的实践，要求愿意向他人的在场、经验与差异敞开自己。沃尔夫的拥抱概念通过四个动作来阐明接纳的过程，即张开双臂、等待、合拢双臂与再次张开，它们在神学上分别反映了开放、对自由的尊重、对差异的接纳以及对被拥抱者自主性的承认。[37]在面向难民移民的跨文化事工中，这四个动作既可作为评估也可作为建构教会实践的基础，将邻舍视为拥有身份、经验、尊严与能动性的人。拥抱成为一个神学框架，敦促教会超越仅以施予援助为导向的事工模式，迈向在跨文化相遇中具有对话性、包容性并尊重差异的关系。

对接纳难民在场的开放（张开双臂，*opening the arms*）是教会发展不受身份、文化或群体成员同一性所限的事工之起点。根据米罗斯拉夫·沃尔夫，对他者的接纳始

[33]Alfred R. Brunsdon dan Christopher Magezi, "Fostering Embracement, Inclusion and Integration of Migrants in Complex Migration Situations: A Perspective from Matthew 25:31–46 and Hebrews 13:1–2," *HTS Teologiese Studies / Theological Studies* 76, no. 2 (2020): 7–8, https://doi.org/10.4102/hts.v76i2.5966.

[34]Silas W. Allard dkk., *Christianity and the Law of Migration*, with Emory University, Law and Religion (Routledge, 2022), 165–67.

[35]Miroslav Volf dan Ryan McAnnally-Linz, *Public Faith in Action: How to Engage with Commitment, Conviction, and Courage* (Brazos Press, 2016), 125.

[36]Volf dan McAnnally-Linz, *Public Faith in Action*, 125, 128.

[37]Miroslav Volf, *Exclusion and Embrace: A Theological Exploration of Identify, Otherness, and Reconciliation*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2019), 143.

于愿意为他者的在场腾出空间，而不把自己的身份变成限制关系的机制。[38]当教会面对难民时，这一原则便显得切题，因为难民的存在往往带有不确定、疏离以及进入新社会环境的机会有限等特征。评判他们的在场，首先不应基于共同的宗教、国籍、语言或其可能提供的社会贡献，而应承认他们是拥有内在尊严的人的存在。拥抱神学要求从盲目的猜疑彻底转向开放的逻辑。必须在主动主体的范式中理解移民，他们可以同时既是客人又是主人。[39]

愿意为相遇的过程留出空间（等待，*waiting*）凸显出，对难民的事工不能通过草率、家长式或以单方面适应为导向的进路来建立。沃尔夫将等待置于接纳之动态的一部分，这预设了敞开自己的一方不能单方面决定另一方必须如何回应这场相遇。[40]流离失所、丧失、不安全以及与原居地的断裂等经历，可能影响一个人如何对新的群体建立信任。因此，教会需要避免要求难民立即适应东道群体的习惯、规范或期待的事工。同行应当关注难民自身的需要、经验与选择，包括给予他们机会表达其愿望，并决定他们所期望的参与形式。因此，跨文化事工中的等待是一种关系性的忍耐实践，把难民的自由、声音与经验置于建立关系过程的重要位置。它并非对爱的行动的推迟。

接纳在具体关系中的体现（合拢双臂）表明，开放的态度需要转化为超越款待的象征或一时援助的投入。米罗斯拉夫·沃尔夫（Miroslav　Volf）的“拥抱”主张一种包容性的拥抱，即愿意把他者带入关系之中，而不抹去其固有的差异。[41]这样的事工使难民得以作为拥有知识、能力、经验与抱负的个体参与群体的生活。事工可致力于开辟对话空间、共同活动、社会陪伴、能力建设，以及使难民能够在教会群体和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中作出贡献的各种参与形式。拥抱的发生，是以神之拥抱的同一种拥抱来环抱他们。[42]这一阶段涉及去除自我中心，并容许自己被陌生人的临在所塑造。[43]它为不同的人腾出空间，而不吞没那些差异。

---

[38]Volf, *Exclusion and Embrace: A Theological Exploration of Identify, Otherness, and Reconciliation*, 143.

[39]Anna Rebecca Solevåg and Leonardo Marcondes Alves, “Hospitality: A Migrant Reading of the Parable of the Returning Son,” *Religions* 16, no. 2 (January 2025): 4, https://doi.org/10.3390/rel16020125.

[40]Volf, *Exclusion and Embrace: A Theological Exploration of Identify, Otherness, and Reconciliation*, 144–45.

[41]Volf, *Exclusion and Embrace: A Theological Exploration of Identify, Otherness, and Reconciliation*, 145–46.

[42]Huen Wai Yan, “Miroslav Volf’s Theology of Embrace, Vernacular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Hong Kong Identity,” *Practical Theology* 15, no. 3 (May 2022): 220–21, https://doi.org/10.1080/1756073X.2021.2009623.

[43]Richard Kearney, “A Game of Jacks: Review Essay of John D. Caputo’s Recent Works,” *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 47, no. 5 (June 2021): 578–79, https://doi.org/10.1177/01914537211017168.

尊重难民身份认同的自由与延续性（再度张开双臂）申明，教会的事工不可将接纳变成按照接待群体的利益来捆绑、控制或塑造他者的手段。沃尔夫提醒我们，“拥抱”的动力并不止于关系上的合一，它同样包含保留他异性的空间，使被接纳者不丧失继续做自己的自由。[44]接待者与客人之间的“间隙”必须保持平衡，以便保存他异性而不使其被消解。教会的临在，不以难民在多大程度上遵循本地群体的生活模式、文化或身份来衡量其陪伴是否成功。相反，事工需要支持他们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语言、传统与生活选择，同时与新社会建立关系。这种尊重还包括承认难民有能力确定自己的需要、管理自己的生活、建立关系并塑造自己的未来。

尽管“拥抱”神学为发展向难民和移民开放的教会事工提供了基础，但其应用需要置于比人际关系更为宽广的解读之中。如果各种社会与制度机制继续维持难民的边缘化处境，仅凭款待、团结或个人陪伴，对难民的接纳便无法充分实现。克里斯蒂亚万（Kristiawan）提出的欣赏性、批判性与转化性进路[45]，可以作为发展教会事工的一种视角，这种事工不仅回应难民的当前需要，也审视影响他们获得保护、生活机会与社会承认的种种条件。与此同时，“拥抱”神学并不承诺开放总会带来和谐的关系或相互的接纳。拥抱的过程包含不确定性，因为提供接纳的一方无法完全掌控被邀请进入关系的一方的回应。等待这一要素表明，相遇不能被强迫，关系的成功也不能仅仅取决于率先敞开自己的一方的意愿。[46]这种不确定性在难民事工中意义重大，因为教会可能面临拒绝、不信任、利益冲突，以及要求服事者作出牺牲的处境。接纳也不会自动产生可预期的改变，无论对难民还是对所涉及的教会群体皆然。跨文化的相遇实际上可以通过并不总是轻松或舒适的过程，改变双方的理解、地位与经验。这种开放植根于基督自我舍己的生命模式，以及三一神生命中的爱的关系，因此拥抱不能被理解为不含风险的行动。拥抱难民和移民的教会，所面对的不仅是需要帮助或愿意建立友谊的人，还有差异的经验、张力以及冲突的可能。诚然，当教会所践行的团结遭遇社会压力、制度性利益或更广泛环境的排斥时，接纳可能使教会陷入脆弱的处境。“拥抱”的事工并不是保证理想结果的实践。坦率地说，它是一种神学上的委身：在风险、不确定与局限之中，持续建立尊重人的尊严的关系。

作为拥抱共同体的教会：面向难民与移民的跨文化事工

针对上述结构性的反对意见，笔者提出，沃尔夫“拥抱”的四个阶段需要被具体地重新阐述为面向难民与移民的跨文化教会事工模式，使其不至于仅仅停留在抽象的

[44]Volf, *Exclusion and Embrace: A Theological Exploration of Identify, Otherness, and Reconciliation*, 147.

[45]Danang Kristiawan, “Merengkuh Yang Lain: Dialog Interreligius Dan Transformasi Diri Terhadap Yang Lain,” *Mitra Sriwijaya: Jurnal Teologi Dan Pendidikan Kristen* 1, no. 1 (July 2020): 62.

[46]Volf, *Exclusion and Embrace: A Theological Exploration of Identify, Otherness, and Reconciliation*, 148.

关系伦理层面。选择跨文化事工作为应用方向，是因为它兼具团契的向度与服务性倡导（diakonia）的向度，从而回应前文提出的两项反对意见：关于“拥抱”的个人局限性的反对意见，通过服务性与结构性的向度得到回应；而关于结果不确定性的反对意见，则通过教会的制度性承诺得到回应，这种承诺并不仅仅依赖个人的自发意愿。

在张开双臂的阶段，跨文化事工意味着教会有意识地向难民与移民敞开其敬拜与团契的空间，提供跨语言可及的礼仪，并且不把他们当作偶尔来访的客人，而是视为基督身体中理所当然的成员。在等待的阶段，教会克制自己，不要求难民与移民立即放弃其原有的敬拜实践与原生文化以迎合多数群体的敬拜风格，而是提供对话的空间，在平等的基础上商议共同团契的形式。在拥抱的阶段，教会把接纳转化为具体的服务性倡导行动：关于居留身份的法律援助、获得医疗与教育的途径、跨文化的职业培训，以及为更公正地对待难民的公共政策而倡导，而不是季节性的慈善救济。在释放的阶段，教会的临在确保所发生的融合不抹去难民与移民原有的文化身份与灵性，例如在教会生活中为他们的母语、音乐和独特的灵修形式留出空间。教会通过谨慎留意，不以完全同化作为衡量事工成功的标准。

法律援助、获得医疗与教育的途径、职业培训及政策倡导等活动，虽然形式上与传统慈善相似，却并非一般的慈善。它们是真正“拥抱”的体现。区别在于三个根本方面：（1）权力关系：传统慈善是从主动施予者与被动受助者的位置出发，而“拥抱”要求教会去除自我中心，并开放被难民与移民本身所改变的可能；（2）相互性：在“拥抱”中，接纳不是单向的，而是对话性的、平等的，这在等待与释放的阶段中可见一斑，这两个阶段为移民的能动性与文化身份留出空间；（3）最终目的：慈善往往止于满足短期的物质需要，而“拥抱”旨在恢复关系，并承认“他者”作为伙伴而非施舍对象的完整尊严。因此，这四种事工形式成为制度化的“拥抱”，其中每一项具体行动始终都以对同胞的存在性开放为框架。

这一模式要求教会发展勇敢而充满风险、却依然满怀怜悯的事工，[47]以一贯的态度拥抱不同族群、宗教与法律身份的弱势者，而不陷入时而接纳、时而拒绝的悖论立场。[48]通过这样的拥抱，教会蒙召作为寻求庇护者的“敞开之家”而临在，同时培养对自身作为“被连根拔起”的朝圣群体之身份的自觉，[49]这种自觉使教会不再处于完全主权性的接待者的位置，而是使其成为同样被呼召走出自身、迈向“他者”的同路人。于是，

[47]Darren Cronshaw dkk., “Mission as Hospitality with Refugees and Other Migrants: Exploring Ross Langmead’s ‘Guests and Hosts’ in Australian Churches,” *Mission Studies* 40, no. 1 (2023): 151–53, https://doi.org/10.1163/15733831-12341890.

[48]Amy Casteel, “Setting a New Course? A Practical Discussion about Migration and the Bible,” *Open Theology* 7, no. 1 (2021): 600–601, https://doi.org/10.1515/opth-2020-0182.

[49]Ezequiel Silva, “The ‘foreigner-host’. Revisiting Cacciari’s ‘the common’ in the Context of Migration,” *Scriptura* 124, no. 1 (2025): 7, https://doi.org/10.7833/124-1-2290.

移民不再仅仅被视为团结的受惠者，或需要被“克服”的社会问题。神学上的能动性将成为移民的地位，揭示接待群体的社会—宗教结构的局限与排他性，同时使他们成为实现跨文化事工的伙伴，而这种事工是教会忠于基督的具体形式，基督自己就是一位难民。

结论

本研究申明米罗斯拉夫·沃尔夫的“拥抱”神学作为发展教会难民与移民事工之基础的相关性，这一事工通过四种关系性动力展开，即开放、等待、拥抱与释放。这四种动力被发展为一种神学取向，用以形成植根于尊重人的尊严、相互性、参与以及承认身份多样性的跨文化事工。在此框架下，难民与移民的临在也成为教会神学反思的空间，使教会得以在面对人类流离失所的现实时，检视自己对团结、款待、信仰群体与社会责任的理解。本研究的贡献在于通过建构性进路发展一种移民神学，把沃尔夫的思想与印度尼西亚教会事工的处境相结合，同时从关系性与跨文化的视角拓宽公共神学的讨论。进一步的发展有待于：关于教会对难民与移民之回应的实证研究、对难民群体经验的民族志探索、以拥抱为基础的陪伴模式的实施、教会款待实践的跨宗派研究，以及为跨文化事工中的传道人和教会领袖编制培育课程。这一系列研究有望加强所发展的神学框架的处境有效性，同时推动其在教会实践中的应用，使之回应时代、具有包容性，并以全球移民动态中的人际关系为导向。

参考文献

Adiprasetya, Joas. *Berteologi dalam Iman: Dasar-Dasar Teologi Sistematika-Konstruktif*. BPK Gunung Mulia, 2023.

Ahmed, Sara. *Strange Encounters: Embodied Others in Post-Coloniality*. Routledge, 2000.

Allard, Silas W., Kristin E. Heyer, dan Raj Nadella. *Christianity and the Law of Migration*. With Emory University. Law and Religion. Routledge, 2022.

Anggito, Albi, dan Johan Setiawan. *Metodologi Penelitian Kualitatif*. CV Jejak, 2018.

Bauman, Zygmunt. *Stranger at Our Door*. Polity Press, 2016.

Betts, Alexander, dan Paul Collier. *Refuge: Transforming a Broken Refugee System*. Penguin Random House UK, 2017.

Brunsdon, Alfred R., dan Christopher Magezi. “Fostering Embracement, Inclusion and Integration of Migrants in Complex Migration Situations: A Perspective from Matthew 25:31–46 and Hebrews 13:1–2.” *HTS Teologiese Studies / Theological Studies* 76, no. 2 (2020). https://doi.org/10.4102/hts.v76i2.5966.

Casteel, Amy. “Setting a New Course? A Practical Discussion about Migration and the Bible.” *Open Theology* 7, no. 1 (2021): 590–604. https://doi.org/10.1515/opth-2020-0182.

Castles, Stephen, Hein de Haas, dan Mark J. Miller.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Cronshaw, Darren, Hanna Hyun, Peter Laughlin, Titus S. Olorunnisola, dan Stephen Parker. "Mission as Hospitality with Refugees and Other Migrants: Exploring Ross Langmead's 'Guests and Hosts' in Australian Churches." *Mission Studies* 40, no. 1 (2023): 150–76. https://doi.org/10.1163/15733831-12341890.

Esses, Victoria M., dan Leah K. Hamilton. "Xenophobia and anti-immigrant attitudes in the time of COVID-19." *GPIR: Group Processes Intergroup Relations* 24, no. 2 (2021): 253–59.

Fassin, Didier. *Humanitarian Reason: A Moral HIstory of the Present*. Diterjemahkan oleh Rachel Gomm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Fong, Paul C. "An Understanding of Christians' Roles in Human Migration through the Biblical Theme of Shamar: From Genesis to the Good Samaritan." *Religions* 14, no. 5 (2023): 600. https://doi.org/10.3390/rel14050600.

Gibbs, Raymond J. *Methapor Wa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Hall, Stuart.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

Huen Wai Yan. "Miroslav Volf's Theology of Embrace, Vernacular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Hong Kong Identity." *Practical Theology* 15, no. 3 (2022): 214–29. https://doi.org/10.1080/1756073X.2021.2009623.

Kearney, Richard. *Strangers, Gods and Monsters: Interpreting Otherness*. Routledge, 2003.

Koser, Khali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Kristiawan, Danang. "Merengkuh Yang Lain: Dialog Interreligius Dan Transformasi Diri Terhadap Yang Lain." *Mitra sriwijaya: Jurnal Teologi dan Pendidikan Kristen* 1, no. 1 (2020): 60–72.

Kwon, Jee Yun. "The Understandingof the Issue of Yemenirefugees in Korea," Muslim-Christian Encounter 11, no. 2 (September 2018): 81–112, https://doi.org/10.30532/mce.2018.11.2.81.

Levinas, Emmanuel. *Totality and Infinity*. Diterjemahkan oleh Alphonso Lingi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1.

Mukaromah, Zaitun, dkk. "Kebijakan Pemerintah Amerika Serikat terhadap Migran (Muslim)." *Jurnal Mercatoria* 15, no. 2 (2022): 75–86. https://doi.org/doi.org/10.31289/mercatoria.v15i2.7362.

Norwood, Jeremy S. "Labor Exploitation of Migrant Farmworkers: Risks for Human Trafficking." *Journal of Human Trafficking* 6, no. 2 (2020): 1–15.

Pantan, Frans. "Humanistic and Inclusive Christian Education: A Framework for Learning Transformation," HTS Teologiese Studies / Theological Studies 81, no. 1 (May 2025): a10488, https://doi.org/10.4102/hts.v81i1.10488.

Pohl, Christine D. *Making Room: Recovering Hospitality as a Christian Traditio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Silva, Ezequiel. "The 'foreigner-host'. Revisiting Cacciari's 'the common' in the Context of Migration." *Scriptura* 124, no. 1 (2025): 1–12. https://doi.org/10.7833/124-1-2290.

Solevåg, Anna Rebecca, dan Leonardo Marcondes Alves. "Hospitality: A Migrant Reading of the Parable of the Returning Son." *Religions* 16, no. 2 (2025): 1–15. https://doi.org/10.3390/rel16020125.

Volf, Miroslav. *Exclusion and Embrace: A Theological Exploration of Identify, Otherness, and Reconciliation*. Abingdon Press, 2019.

Volf, Miroslav, dan Ryan McAnnally-Linz. *Public Faith in Action: How to Engage with Commitment, Conviction, and Courage*. Brazos Press, 2016.